

中国早期印度来华僧人考及弥勒经典的传译<sup>①</sup>

刘慧

(上海海事大学 徐悲鸿艺术学院, 上海 200135)

[摘要] 中国早期佛教,除从中国本土考察佛教之发展状况外,还应考虑印度来华僧人对早期佛教发展的影响。同时,引发对中国早期弥勒经典传译的考证。

[关键词] 印度来华僧人;弥勒经典;传译

中国早期佛教,除从中国本土考察佛教之发展状况外,还应考虑印度来华僧人对早期佛教发展的影响。从四世纪起,印度僧人开始大规模进入汉地,从而使汉地佛教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印度僧人给予汉地佛教以重大的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形成。这一影响主要体现为,印度僧人的来华对佛经的传译直接加速了汉地佛教对印度佛学理论的吸纳过程。

## 一、中国早期印度来华僧人

东晋时印度来华僧人共八人:僧伽提婆<sup>②</sup>、卑摩罗叉<sup>③</sup>、佛驮跋陀罗<sup>④</sup>、竺昙无兰<sup>⑤</sup>、僧伽难陀<sup>⑥</sup>、僧伽罗叉<sup>⑦</sup>、昙摩抑<sup>⑧</sup>、僧伽跋弥<sup>⑨</sup>。前秦时期,入长安译经者有三人,均为罽宾人:僧伽跋澄<sup>⑩</sup>、昙摩蜚<sup>⑪</sup>和僧伽提婆<sup>⑫</sup>。后秦时期印度来华僧人有七人:鸠摩罗什<sup>⑬</sup>、昙摩耶舍<sup>⑭</sup>、昙摩掘多<sup>⑮</sup>、弗若多罗<sup>⑯</sup>、卑摩罗叉<sup>⑰</sup>、佛陀耶舍<sup>⑱</sup>和佛驮跋陀罗。北凉时印度来华僧人有二人:昙无讖<sup>⑲</sup>、浮陀跋摩<sup>⑳</sup>。

“二秦”时代罽宾僧人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昙摩耶舍、卑摩罗叉、佛陀耶舍、佛驮什等在关中及南方的活动,使有部《毗昙》、《阿含》及《十诵》、《四分》等律学系统地直传人华;鸠摩罗什受学于须利耶苏摩,在姚秦长安译出《三论》、《般若》、《法华》、《阿弥陀》、《维摩诘》等经论,系统介绍了龙树中观学派学说,较为全面地重译了大乘典籍,为其后汉地佛教的发展培养了人才,为后世译场的组织提供了范例;佛驮跋陀罗传承罽宾佛大先系统禅法,并与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以及铁萨罗尼众等先后进入江南,承北方“二秦”佛教发展之余绪,对大乘义理及僧尼戒律的完善进行了有效的补充;而真谛更是弘传了印度无著、世亲唯识之学,开创了汉地的大乘瑜伽学系;北朝时佛陀禅师、菩提流支、菩提达摩、闍那耶舍师徒、那连提黎耶舍等则在广弘禅法的同时,对北方佛经翻译和义学的传播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

在这些印度来华僧人中,佛驮跋多罗与鸠摩罗什均译出弥勒经典。佛驮跋多罗(359~429),“佛驮跋陀罗。此云觉贤。本姓释氏。迦维罗卫人。甘露饭王之苗裔也。……至年十七与同学数人俱以习诵为业。众皆一月。贤一日诵毕。其师叹曰。贤一日敌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业精勤。博学群经多所通达。”<sup>①</sup>受西行求法沙门智严之请来中国

作者简介:刘慧(1978—),女,黑龙江人,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史与美术考古。

传习禅法。佛驮跋陀罗于东晋义熙七年(411年)离开关中南下庐山。慧远对其十分欢迎,并致信关中,跋陀罗留驻庐

<sup>①</sup>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中印文化交流视角中弥勒造像文化特征的起源与历史变迁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ZH104。

<sup>②</sup>僧伽提婆,东晋太元十六年(391年),于庐山般若台译出《阿毗昙心论》四卷、《三法度论》二卷,慧远为之作序。隆安元年(397年),提婆重译《中阿含经》六十卷,校改了《增壹阿含经》五十一卷。

<sup>③</sup>卑摩罗叉,译出《毗尼诵》,六十一卷。

<sup>④</sup>竺昙无兰,意译法正,天竺人。自孝武帝太元六年至二十年(381—395年)间于扬都(建康)谢镇西寺译经六十一部、六十三卷。

<sup>⑤</sup>僧伽难陀,罽宾禅师。

<sup>⑥</sup>僧伽罗叉,罽宾人,入华时间不详。

<sup>⑦</sup>昙摩抑,师子国人。

<sup>⑧</sup>僧伽跋弥,师子国人,译出《弥沙塞律抄》(《提阿波檀那卷属鼻臙经》)一卷。

<sup>⑨</sup>僧伽跋澄,意译众现,罽宾人。自建元十七年(381年)至二十一年(385年),在释道安的组织下,跋澄译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十卷,《毗婆沙论》十四卷,《僧伽罗刹所集经》三卷,共计三部二十七卷。

<sup>⑩</sup>昙摩蜚,意译法爱,众经录皆谓其为印度人。符坚建元十八年(382年)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钞经》卷。

<sup>⑪</sup>僧伽提婆,又作提和,意译众天,罽宾人。姓瞿昙氏。自建元十九年(383年)至建元末(385年)。分别于长安、洛阳译出《阿毗昙八键度论》三十卷,《阿毗昙心》十六卷、《毗婆沙阿毗昙》十四卷。

<sup>⑫</sup>昙摩耶舍,意译法明,罽宾人。译有《差摩经》一卷,弘始九年(407年)写成《舍利佛阿毗昙》梵本,弘始十六年(414年),译成汉文二十二卷,后又译出《乐瓔珞庄严经》一卷。

<sup>⑬</sup>昙摩掘多,意译法藏,天竺人。与昙摩耶舍一同译出《舍利弗阿毗昙》。

<sup>⑭</sup>弗若多罗,又作不若多罗,意译功德华,罽宾人。

<sup>⑮</sup>卑摩罗叉,意译无垢眼,罽宾人。精通《十诵律》。

<sup>⑯</sup>佛陀耶舍,意译觉明、觉名、觉称,罽宾人。弘始十二年(410年)在长安中寺译出《四分律》,共四十五卷。此外,耶舍又译出《四分律戒本》一卷,《长阿含经》二十二卷(与竺佛念合译)。

<sup>⑰</sup>昙无讖,亦作昙摩讖、昙无忏,意译法护,中天竺人。北凉玄始十年(421年),十月间,译出《大涅槃经》前分,后又从于闐求得中分、后分,足译成三十卷。

<sup>⑱</sup>浮陀跋摩,亦作佛陀跋摩,意译觉铠,天竺人。

山一年,为慧远译出了《修行方便禅经》《庚伽遮罗浮迷》,译曰《修行道地》,又作《达摩多罗禅经》二卷,对慧远的修持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此后,跋陀罗至荆州,得到太尉刘裕的尊敬,并于义熙九年(413年)随之赴建康居道场寺。跋陀罗“仪范率素,不同华俗,而志韵清远,雅有渊致”,深得江南僧俗风雅玄趣的认同,被称为“天竺王、何风流人也”。刘宋元嘉六年(429年)去世。自公元413至420年间共译出佛典十一部,其中与弥勒信仰有关的为公元418年译出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鸠摩罗什(344~413),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家之一。“此云童寿。天竺人也。家世国相。什祖父达多。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炎。聪明有懿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sup>[2]</sup>罗什生于龟兹,7岁随母出家,9岁随母去罽宾游学,从名德法师盘头达多学《杂藏》《中阿含》《长阿含》等。12岁随母回龟兹,时遍通小乘经论及世俗文典。后随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学《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复从佛陀耶舍授读《十诵律》等。罗什广学大小乘经论,讲经说法,成为中观大师,名闻西域诸国,在汉地也有传闻。据《出三藏记集》载,罗什在弘始四年至十五年(公元402~413年)共译出经论35部,294卷。其中所译弥勒经典为《弥勒成佛经》(402)、《弥勒下生经》(402~412)与《弥勒菩萨本愿待时成佛经》。

这一时期印僧的来华,不但对此前汉地佛教的已有成果进行了整合,同时也成为汉地佛教迅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从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除汉地佛教发展水平的客观因素外,印度僧人在其中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并将印度佛学各体系学说中最具代表性的集大成之作译传至汉地,引导汉地佛学的发展方向。

## 二、中国弥勒经典的传译

“盖在西汉文景帝时,佛法早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向中亚传播,自意中事。”依史实言,释教固非来自与我国接壤之匈奴,而乃传自武帝所谋与交通之各国也。随着交往的不断发展,源于印度的佛教被连续不断地输送到中国,弥勒信仰作为佛教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伴随着这种交往传入中国。

就中国弥勒经典的传译,日本学者松元文一郎<sup>[3]</sup>统计有关弥勒的汉译经典达37种之多,台湾学者杨惠南<sup>[4]</sup>就其做了十分细致的整理和分类,从内容来看,彼此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把弥勒仅仅当成佛弟子,第二种经典虽然表现了未来佛的思想,但对于其净土的思想却一句也没有提到,第三种经典为表现了弥勒的净土思想。

最早涉及弥勒的记载在吴·支谦译《维摩诘经》中,已出现弥勒菩萨:

于是佛告弥勒菩萨。汝行诣维摩诘问疾。弥勒白佛言。我不堪任诣彼问疾。……卿弥勒。在一生补处。世尊所蒞无上正真道者。为用何生得。弥勒。决用过去耶当来

耶现在耶。去者生尽。未来无对。现在无住。<sup>[5]</sup>

但此经并非是对弥勒信仰的传译,其流通范围只限于僧侣、皇室贵族和部分士大夫阶层。另有东汉末年译经家安世高翻译的《大乘方等要慧经》在这部经中亦提到了“弥勒”:

尔时弥勒菩萨叉手白佛言。世尊。我欲小有所问。……弥勒问言。云何菩萨摩訶萨不退转法。……于是弥勒受教。一心静听。佛告弥勒。菩萨有八法具足。……弥勒菩萨及诸会皆欢喜。<sup>[6]</sup>

比安世高稍微晚来中国的月氏国译经家支娄加讷也曾翻译过包含有弥勒思想的经典《道行般若经》中《不可计品第十一》中这样描述:

若复有菩萨从兜术天上来生是间,或从弥勒菩萨闻是深经中慧,今来生是间,持是功德,今逮得深般若波罗蜜。<sup>[7]</sup>

西晋译经家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卷十一《大事兴品第五十一》中关于弥勒菩萨的描述:

须菩提,当只是菩萨摩訶萨从兜术天上,亦复具足功德善本。何以故?是菩萨从弥勒菩萨所闻是深经,以是故今来生是间,得深般若波罗蜜闻便即解信乐守行。<sup>[8]</sup>

另有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亦有提及弥勒菩萨:

至心合掌胡跪谛观。一日至三日心不错乱。命终之后生兜率天。面见弥勒菩萨色身端严。应感化导。既得见已身心欢喜入正法位。佛告父王。如是观者名为正观。若异观者名为邪观。<sup>[9]</sup>

这些经典可以看出早期所提及的弥勒,均以“弥勒菩萨”出现。除了早期有涉及弥勒菩萨的经典外,确立弥勒信仰有别于其他佛教盛众信仰的是弥勒专门经著,即“弥勒六经”的出现。这六部代表弥勒信仰的经典为:

一、《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竺法护于太安二年(303)译成

二、《弥勒大成佛经》,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四年(402)译成

三、《弥勒下生成佛经》,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四~十四年(402~412)译成

四、《佛说弥勒来时经》,译者失名

五、《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刘宋沮渠京声(455左右)译成

六、《弥勒下生成佛经》,义净于大足元年(701)译成  
“弥勒六经”除义净所译《弥勒下生成佛经》在唐代译出外,其余五部均在五世纪中叶译出,这些经典的传译,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晋译经家竺法护在太安二年(303)所译《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

闻弥勒已成佛道。将八万四千梵志之众往至佛所求作沙门。……弥勒如来出现世间成等正觉。数千万众往至佛所。……尔时弥勒当说三乘之教如我今日。弟子之中大迦叶者行十二头陀。过去诸佛所善修梵行。此人当佐弥勒劝化人民。<sup>[10]</sup>

(下转第32页)

所谓“弥勒六经”中,有同本异译的,也有原本内容就不相同的,只不过是选取了现存藏经中最能明确地阐述弥勒净土思想和宣传其信仰的六部经来作为其统称而已。因此,并不是说有关弥勒的经典除了这六部经以外再也没有了。

印。王振鹏有几个能传其画艺的弟子,如王麟、朱玉、李容瑾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李容瑾,有《汉苑图》传世,这幅画界画工整,折算准确,殿阁层叠,依山傍水,气势比王振鹏的《阿房宫图》更为开阔,称得上青出于蓝。

王振鹏的人物画,师承李公麟白描法,线条细劲流畅,人物形象生动传神,有很高水平。其题材广泛,曾作《货郎图》《角抵图》《竹林七贤图》《圣母贤妃图》等,可惜的是这些画今已无以得见,其《姨母养育图》真伪有待考订。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王振鹏虽以界画之工见长,但其人物却不为其“工”所缚,无论是其题材,还是其笔调,往往流露出某种文人的情致。《伯牙鼓琴图》(故宫博物院)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王振鹏唯一的一卷人物画。据《吕氏春秋·本味》记载,伯牙善鼓琴,只有钟子期能理解琴中之音。子期死后,伯牙痛于没有知音,就终身不再鼓琴。

王振鹏这幅画中,两人在石头上对面而坐,身后童子侍立。伯牙长髯拂胸,气派高雅,双手抚弄着放在膝上的古琴。子期翘着足,意态潇洒,头微微地低着,正全神贯注地品赏琴音。人物神情生动,线条流利劲健,造型、笔法均近于宋代李公麟,该图在章法安排上左右对称,平稳妥当,但人物上下错落,富于变化,其形象造型高古清奇,将伯牙弹琴、钟子期聆听的情形表现得极为概括而生动。特别是伯牙演奏时的双手姿势,一拨一按,轻提慢揉,描绘得可谓既准确,又精妙,然线条则又能曲折变化而呈元人之风韵,是元代人物画中不可多得的作品,从此画中可窥其人物画造诣之一斑。

王振鹏作为一名宫廷画家,为统治阶级服务,其画面讲究工致富丽,他以擅“界画”著称,其界画风格工整秀丽,被公推为元代第一。

(上接第21页)后秦鸠摩罗什在弘始四年(402)译成《佛说弥勒大成佛经》与弘始四~十四年中(402~412年)译成《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 《佛说弥勒大成佛经》

欲闻如来说未来佛开甘露道。弥勒名字功德神力国土庄严。以何善根何戒何施何定何慧何等智力。得见弥勒。于何心中修八正道。……世尊。愿使我等于未来世。得见人中最大果报。三界眼目光明。弥勒。普为众生说大慈悲。<sup>[11]</sup>

#### 《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尔时弥勒佛于华林园。其园纵广一百由旬。大众满中。初会说法。九十六亿人得阿罗汉。第二大会说法。九十四亿人得阿罗汉。第三大会说法。九十二亿人得阿罗汉。弥勒佛既转法轮度天人已。<sup>[12]</sup>

#### 失译人名附东晋录的《佛说弥勒来时经》

佛常言。佛去后当有弥勒来。愿欲从佛闻之。佛言。弥勒佛欲来时。阎浮利内地山树草木皆焦尽。……弥勒得道为佛时。于龙华树下坐。……弥勒得佛时。有八万四千婆罗门。皆往到弥勒所师事之。则弃家作沙门。弥勒到树下坐。用四月八日明星出时得佛道。<sup>[13]</sup>

#### 刘宋·沮渠京声所译之《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

佛告优波离弥勒先于波罗捺国劫波利村波婆利大婆罗门家生。……身紫金色光明艳赫如百千日。上至兜率陀天。其身舍利如铸金像不动不摇。……如弥勒下生经说。佛告优波离。是名弥勒菩萨于阎浮提没生兜率陀天因缘。<sup>[14]</sup>

#### 西晋译经家竺法护所译《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

佛语贤者阿难。弥勒菩萨以是善权。得无上正真之道最正觉。阿难。弥勒菩萨求道本愿。使其作佛时。令我国中人民。无有诸垢瑕秽。……弥勒。当得上正真之道成最

正觉。所以者何。弥勒菩萨本愿所致。<sup>[15]</sup>

通过这些经典可以看出,弥勒经典的传译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早期经典主要为弥勒信仰“上生”“下生”“成佛”的思想内涵。这些有关弥勒的经典在五世纪中叶就已经译出,可以看出在早期佛教传入中国时,就已经逐渐出现了弥勒信仰的热潮,由于民间对弥勒信仰的接收层面不断扩大,反过来也促进了弥勒经典的不断传译。同时,弥勒经典的传译对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1]《大正藏》第50卷,第360页。
- [2]《大正藏》第50卷,第330页。
- [3]松本文一郎:《弥勒净土论》,丙午出版社,1911年,第19页,转引自田村圆澄《半珈思惟像的诸问题》,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10页。
- [4]杨惠南:《汉译佛经中的弥勒信仰—以弥勒上、下经为主的研究》,《文史哲学报》第35期,第119—181页,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1987年12月。
- [5]《大正藏》第14卷,第519页。
- [6]《大正藏》第12卷,第348页。
- [7]《大正藏》第8卷,第451页。
- [8]《大正藏》第8卷,第80页。
- [9]《大正藏》第15卷,第643页。
- [10]《大正藏》第14卷,第421页。
- [11]《大正藏》第14卷,第428页。
- [12]《大正藏》第14卷,第423页。
- [13]《大正藏》第14卷,第434页。
- [14]《大正藏》第14卷,第418页。
- [15]《大正藏》第12卷,第186页。